

西方思潮評介

「逃避自由」與「實現真我」

——佛若姆觀點中人之前程的叉路

印萬里

編者按：書評書目雜誌自創刊以來，一直注重中西文學的比較分析工作。自本期起，我們增開西洋思潮評介系列，目的是藉批判性的態度，吸收有助於開擴吾人視野的西洋近世思想。這期我們邀請任教於清華大學的印萬里教授撰述有關佛若姆先生的思想；佛氏的著作極受吾國年青學子的注目，市面譯著頗多，意見紛雜，相信印教授的分析，有助於我們清楚認識這位心理分析學家的一些重要想法。

給非非：

The tenderness of a sensitive heart is not weakness, it is the flame that melts stone and steel. (一顆靈敏的心之溫柔不是軟弱，而是熔化鐵石的火焰)

一

「以實現自我為內涵的積極自由意示着個體獨特性的完全肯定。人雖是生來平等，但也生來相異。……唯有在對別人自我和本身自我的獨特性質予以極度尊崇之條件下，有機性的成長才有可能。這種對於自我的尊敬和愛護是人類文化中最珍貴的成就，而這也正是今日陷於危局中的成就。……」

「我們今天的文化和政治之危機不是由於過份的個人主義，而是因為我們所信以為是個人主義的已經變成一個空殼。唯有當個人和他的長成與幸福成為文化的目標和目的，唯有當人生不需要依賴成功與成就之類的東西作為辯護，個人不受到本身以外任何權力諸如國家或經濟體系的主宰或操縱，唯有當人的良知和理想發自真實和獨特的自我，而非外在（社會）之要求的內心化；唯有當民主制度發展成為這樣的一個社會時，自由才終有勝利的可能。」

上面的這兩段文字引自心理分析家佛若姆（Erich Fromm）的名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這本三十六年前初版的書在今天依然暢銷，更難得的是在今天讀來仍有無限的新鮮感。這本書的寫作背景是納粹政權對於人類自由的威脅。在佛若姆的觀點中，這個威脅的存在和成因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而是在西方歷史中蘊釀已久的個人和羣體的心理困結。納粹主義的潰敗，並不帶來自由的永久勝利；極權主義對於現代羣衆的誘惑，有着十分深入和複雜的原因。民主制度的西方資本社會雖不施加對於自由的有形迫害

，却加重對個人之自發行爲和獨立人格的無形威脅，消除每一個人的獨特性質，窒息他的潛能和思想，消弭人與人間的深入區別，使他成爲失去自我與靈魂的機器人。佛若姆在「逃避自由」和「實現真我」(*Man for Himself*)兩本書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對於七十年代的今天似乎較諸四十年代的當時尤有密切和深刻的意義。

心理書籍和心理題目是這一代年輕人十分着迷的對象。但是他們的關心已非屬於興趣，而是源於焦慮。我不是不是一個正常的人？是不是瞭解自己？有沒有足夠的能力與人相愛或適應社會？是不是真正快樂？別人對於我的印象如何？自我測驗和自我治療的心理手冊，由於這一連串的問題而在近年來充斥書市。年輕人也十分關心自由問題。他們在傳統秩序中感受到拘束，他們要反抗上一代視爲當然的習俗和禁忌。但是規限的逾越或掃除，習尚的變化，甚至性關係的解放，未曾帶來滿足，却是帶來空虛。每一層自由障礙的撤除，徒然暴露了另一層自由障礙的存在。

自由問題是佛若姆著作中的中心問題；而他所討論的自由，在意義上遠超過免於拘束和主宰的狹義或消極之自由。假使消極性的自由是一種狀態，那麼積極意義的自由是一個個體實現他成長、發展、影響、創造之潛能而趨於完善境界的行動過程與意志表現。在這一個殊異的意義層次中，自由問題脫離了傳統上政治與玄學討論的範圍，而涉及到心理的領域，並成爲倫理學中的核心問題。縱使人能够免於物質匱乏和外在禁制，縱使他不受別人意志的主宰和威脅，他也未必定能開闢一條實現潛能、趨向人生之完善境界的途徑。在現代社會裏，使到人生中缺乏積極自由之恆常經驗的最大障礙不是具有敵對意志的外人，也不是施加有形禁制的法律和制度，而是擁有這個人生的個人之本身。在不利環境中成長的人們能够發展出畏懼和逃避自由的心理性格，這種性格結構與社會中主宰的意念和信仰發生動態的作用，相互助長，形成爲對於個體自發性的發展創造以及個體間的深層交通之嚴重障礙。

佛若姆認為，自由的意識，發生在人類覺悟到自己是與周圍的自然環境及其餘人分離的單一個體以後。在此之前，人的一切意義只由於他之為社會的部份。他既不曾想到獨立的人生意義，也沒有創造全新事物和表現獨特行動的能力和渴望。但他却有屬於社會和同於整體的無需置疑之安全。個人的自覺和自由的出現毀滅了這種確信和安全。懷疑、不定、孤獨和無援是換來自由的代價。亞當夏娃違抗了神定的規律，脫離了安全和諧的伊甸園。在象徵的意義上，這是人類自由的開始，是一件「人」的行動。人破壞了自然狀況的和諧，和諧的失落從此成為人類生存的命運。「人類生存……是處於永恆與不可避免的平衡之狀況。人的生活不能徒然重複前有的型態，生存的本體需是獨特的『他』。人是唯一會感受厭煩和不滿的動物，……動物中唯有人的生存是一個需要他自己解決而無法逃避的問題。」

根據佛若姆這段話的看法，自由的途徑是有了理性的人在生存中別無選擇的必取途徑，而且是一條孤獨、不安的艱難途徑。個人的自覺、人的理性和隨之而來的自由，雖可被認為是人之為人的特異稟賦，但他能成為人類生存的極其沉重之負擔。這兩種在不同之人生和歷史經驗中得到的相反之經驗，表現了自由對於人的雙重面貌。

什麼是自由可能帶來的甜蜜？什麼是失去樂園和安全的人生能够享受的果實？答案是成長創造和實現潛能的滿足。每一樣藝術品的創造過程之喜悅，陳示了有限時間與空間中的無限可能。每一件事蹟與功業的締造，遺留了短暫生命的不朽記憶。人與人間心智或情感的偶然交流，顯露了愛與了解的無限力量。自由帶來意義的展現和可能性的實現；自由的人生是無限豐足的人生。

在西方歷史中，現代意義的獨立個人之出現始於中世紀的末期。生活和創造的自由經驗在文藝復興與文化中

呈現出無比的燦爛。但是這個經驗主要限於財富、權力和學藝上的貴族。未來的中產階級和一般的市民，則有如近代德國在戰前之經濟變化中飽受打擊的中低等階層，所感受到的不是新的自信和力量，而是經濟、社會與精神層面的孤立、擺盪和無足輕重。新教革命的路德和喀爾文基於人性邪惡的假設，認為憑藉自我的個人並無選擇善行的能力，故必須接受人類無援與卑賤的認定，降服於神的絕對權威，以他的意志代替本身的意志，以不疑的信仰代替理性的質疑，以自我的貶損和否定贖取最後的拯救。這個迎合多數人之精神需要的教條，壓倒了再生時代之完美的讚頌和他無限尊嚴的信仰，助長了崇拜權力和迷信超越性意志的權威性格。

權威性格中隱含有仇恨、嫉妬、焦慮、不安的特徵。仇恨和嫉妬對外形成自以為是的強烈道義感，向內則變為對於人的尊嚴和能力的鄙視。焦慮和不安導致為工作而工作的狂熱，極端的節省和節欲，過份的使命和責任感，以及視人生為超越性意志之手段而不為自足目的的觀念。這些特徵及其表現終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推動力量，但是它們限制了個人積極自由的過程，阻礙了豐富完善的人生之追求。

資本社會否定與抑制自我的方式，是透過童年以來的教養和教育，使個人接受社會習俗所認可的期望和目標，「他以為這些期望和目標真正屬於自己，而實際上只是外在社會之索求的內心化。」「現代人的作為中所關心的自我乃是社會的自我，這個自我主要是由個人被認為需要裝扮的角色所構成。」每個人以為自己的行為都是依據「自利」的現實性原則，而事實上他的生存已然盲從了並非真屬自我的目標。在消費行為上他接受廣告的哄騙和跟隨流行的款式，漠視自己的需要和好惡；在意見上他聽從公共媒介的宣傳和知名專家的結論，捨棄本身的判斷和甄別能力；在工作 and 社交上他淹滅自己獨特的人格，代替以一個適合市場需要的虛飾刻板之人格。正由於他失去了真正的自我，他在惶恐中必須符合於外間迅變的時尚，贏取同樣惶恐的別人之認可、稱許和妬羨。只要脫離開社會所重視的財富、名聲、權力和知名度，個人就成為全無殘留意義和特質的虛無概念。

因此，現代人的生活實際是陷於濃厚的幻覺之中。人是否真正那麼嚮往無法享用而只能安慰的抽象財富？是否真正愛好毫無了解的陌生人對於我的名聲之印象？是否真能從操縱與支配別人的生活 and 意願中獲得快樂和

滿足？或許快樂的意義之了解也在現代生活中起了本質的變化。在利益與快樂的忙碌追求中，在個人人格的離心變化中，現代人漠視着內心深處之潛在能力的枯萎和消竭。冷酷的最終對象，乃是失去一切信仰的個人人格之本身。

真實的自我之失落，一方面使個人成為受社會支配的機器人，一方面也改變了人際關係與社會結合的性質。市場行為的相互需要，代替了基於自發性愛好的情誼；單一標準中成功與成就的競比，代替了彼此間差異和特質的展現與賞慕。社羣變成一羣表面多彩、實質上雷同而可替換捨棄的孤獨個人之集合。於是浪漫愛情的耽迷和幻想成為精神活動的最後防線。「人際關係之膚淺使得許多人希望在戀愛中找到情感的深度和強度。但是，愛並不能分割為獨鍾的愛和對普通人的愛；在每一個文化之中，性愛的關係只是關係人際的一種較強烈之表現。期望戀愛能夠治癒根源於市場型性格傾向的人之孤獨，實是一種謬想。」

三

佛若姆的著作提出了對當前西方社會中一般人平庸慣常之人生的尖銳而深入之分析。唯有卡夫卡的「審判」和托爾斯泰的「伊凡之死」(*Death of Ivan Ilych*) 能夠給予讀者同等的震撼效果。但是佛若姆的工具不是細膩的小說藝術，而是精緻的理性思維。抽象的論說也許並不能像文學作品那樣吸引一般中國讀者的興趣，但是要在一個涉及社會心態及倫理之根本與特殊性質的大題目上探求一些積極性的認識和結論，那麼我們的思想不能不進入這樣一個起碼的抽象層面。

「逃避自由」表現了佛若姆穿透過去歷史和眼前現象的洞察能力。這是一本厚實、豐富、組織嚴密的書本。每一頁上都有激發思想的句子，每一概念的陳述都帶着縝密均衡之思維的痕跡。「實現真我」寫得較為散漫和較多重複，立論上也較有可攻擊之處。但是這本書文字的疏暢和說理的淺顯與動人或能使到它更易為國內讀

者接受。

這兩本書對於我們的意義，不僅是由於中國社會在現代化亦即西方化的過程中逐漸呈現了西方社會和文化的一些嚴重問題，更由於佛若姆所強調的個人之發展與創造的機會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向來極其缺乏。作為積極自由之前提的個人的自覺和無羈束的理性，在西方傳統中都是來自希臘文明的恩賜。在以往中國社會中，原本無西方意義之獨立和自足的個人，能够憑藉本身的判斷和意志，建立超乎社會的人之尊嚴和獨立於社會的個體意義。

事實上，中國社會長久以來都以自我的否定視為女性的必須善德。男性甚至能够接受或享受女性之以否定自我和犧牲自我作為愛的奉獻。摧殘男性之自我與限制其發展的社會壓力和家庭暴虐，則可舉紅樓夢中賈寶玉的處境作為顯例。畢竟視大觀園為樂園而不以為心靈之牢籠的在今天仍不乏人。正如佛若姆所說：「在一個有害組成者人生之真正利益的社會裏，殘害人而有助於該社會之機能的活動，也能成為滿足的來源。……幾乎沒有一種活動不能變成愉快，每一個社會的凝聚力量都是基於這個事實。」

佛若姆主張以一套人本主義的倫理取代基於外在權威或是基於社會所塑造之「良心」的倫理。在這個人本主義的理想中，自發性與無障礙的完全成長是個體發展的正常方式與途徑，自由的否定和逃避只是病態的現象。辨別健康和病態的依據，是理智、情感和感性交融的「總體人格」呈現和圓熟之可能，而不是單一行為帶來的快樂或痛苦。這個人本主義在基本精神上具有濃厚的希臘色彩，因它不僅注重人格之各方面的均衡，而且是以審美的方式——相對於依據教條的方式——進行道德的判斷。

使到社會中每一個體實現其成長與創造之潛能的理想，是一個崇高而困難的理想。希臘人的自由建立在奴隸所供給的優裕和閒暇之上。現代人對於平等的堅持尤過於對於自由的愛好，而這兩個概念之間有十分真實的衝突。衝突的化解不能僅憑抽象的原則。「潛能」以及隨之而生的「權力」之概念不能單從個體的觀點給予認定。魚的卵巢中可以孕含幾萬個魚卵，男性作愛時洩出上億的精子。「潛能」的過量供給與必須毀滅是生物現

象的常經。一個女人在生命中能够生育二三十個子女。假使每一個母體的潛能都被認定爲權利甚至實現爲事實，那麼社會不可能還有今天的文明秩序。任何「權利」的概念都是人工的概念，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它的依據；權利的唯一辯護是人的理性判斷。個體的實現潛能之要求，不能僅基於「公平」的抽象而機械之原則。

佛若姆強調積極自由的實現必須基於真實自我的了解。但是在這個認知的困難之外，自由尚有另一種嚴重的障礙，那便是行動勇氣的欠缺。政治自由是最崇高的自由，因爲它的爭取和維護需要支付最大的勇氣。自我的了解，人本主義的倫理觀，和表現行動以及獨立立場的勇氣，構成自由的三個前提。知仁勇在中國古代原是君子的三達德。勇氣的欠缺，使到以往知識界多的是趨炎附勢或固陋窮酸的兩種類型，而少見在理想與行動上追求統一的人物。真正的創造和成長過程不能免於風險，自由的途徑原是孤獨和不安的途徑。因之，這一代年輕人所需要的不只是自我發現和自我認識的智慧，還包括實現行動和迎接孤獨的膽量和決心。在古希臘觀點之中，一切道德的缺陷（諸如勇氣的欠缺）被認爲源於認知的缺陷。蘇格拉底爲真理捐身的決定，只是他真知的表現。但是在現代觀念中，真與善已經失去它們在希臘哲學和悲劇裏的合一性。在佛若姆介紹的動態社會心理學中，我們似乎可以再找到這種合一性的理論基礎。但是這個問題所進入的境界，已不再是「人爲自我」的狹義性「實現潛能」之境界——除非我們能把生命的拋棄也視作生命的實現和完成，把肉體離開人世之後的人格存在也視作現世自我的延伸。古典文明衰落時人類所失去的最珍貴之寶藏，正是這個現世「自我」之永恆的概念。基督教帶給西方人的天國中之永恆，只是這種寶藏的不完善之代替品。天國中答允的是幸福，而不是自由。